

浙江文化“走出去”源流及新时期 对外传播路径剖析

许钧¹

（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要】浙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充满浓郁的人文气息，享有“文化之邦”的盛名。在当下“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有必要从全球视野出发，重视审视浙江文化，挖掘其核心价值以助力浙江文化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参与新时期的国际对话。通过分析浙江文化的开放传统及其自信底蕴，认为实现浙江文化“走出去”，要利用文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文化精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建设传播人才队伍；融合优质媒介平台，拓展对外传播渠道，最终达成讲好浙江故事、传播浙江声音、为世界文明贡献“浙江智慧”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浙江文化 走出去 路径

【中图分类号】:G1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6-0128-06

区域文化是国家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的区域文化既有共同渊源，又各有特色。当下探索中国文化“走出去”正向纵深发展，因此更应当关注、探索区域文化“走出去”的典范。在色彩斑斓的中国地域文化中，浙江文化融吴越和江南文化于一体，具有鲜明的特色和典型的代表性。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浙江自古享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和“文化之邦”等美誉。近年来，在“八八战略”引领下，浙江业已成为国内创新机制最活、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快的省份之一。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起点，浙江正加快与全球各国的互联互通，并已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合作的排头兵。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中，概括总结了“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成功举办，自此形成了以杭州为中心，逐渐带动周边城市向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格局，“走出去”已成为浙江文化建设的重要方向。本文拟通过分析浙江文化的开放传统及其自信底蕴，探讨浙江文化“走出去”的实现路径，以期为浙江文化“走出去”提供建议，进而为区域文化乃至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一些参考。

一 浙江文化“走出去”的优良传统

浙江文化系由浙地先民在与自然条件相调整、与社会发展变革相调适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发展形成的，具有开拓创新、求真务实的鲜明特征。7000年前，浙江沿海平原仍是一片汪洋，并不适宜生存。而浙地先民凭借顽强的意志在此扎根，开垦出田地。河姆渡文化遗址表明，当时的水稻种植、建筑技术和制陶技艺等均已十分发达，由此成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诞生地之一，也是浙江文化的源头所在。

随着自然境候的演变，生存环境的恶化迫使一部分浙江先民漂洋过海寻觅新的落脚之处，由此形成“内越”“外越”之别。

¹**作者简介**:许钧(1954—)，男，浙江龙游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主要从事翻译研究。

根据《越绝书》记载，及至秦始皇时期，“徙天下有罪谪吏民，置海南故大越处，以备东海外越”^②。秦虽并灭六国，唯东海外越不服，因秦朝采取严厉的防卫措施，漂流在东海的外越出海另求生路，主要向日本列岛和南洋列岛等地迁移。从此，他们御海弄潮、披荆斩棘，成为传播越文化的先锋^①。

在中外文化、宗教、科技和文学交流史上，浙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回首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史，浙江涌现了释慧皎、释道宣和释赞宁等翻译名家^②。16至17世纪，欧洲人抵达中国沿海，浙江随即成为最早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区域之一，其中尤以宁波、温州等地最为明显。在全国各省份中，浙江人率先开始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开眼看世界。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是来华传教士，他们揭开了近代历史上浙江与域外文化交流的序幕。一方面，部分浙江文人在来华传教士的影响下开眼看世界，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李之藻和杨廷筠。整个明代历史上，李之藻是少数几个能够真正理解西方科技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也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杭州人。而杨廷筠则致力于调和融会儒家思想和天主教的义理与信仰，他相信天主教符合中国的圣学道统，将西方传教士称作“西儒”。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经过传教士译介到欧洲，尔后经过欧洲学者编织、渲染，为欧洲启蒙思想家带去丰富的精神养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时欧洲思想的发展。在十七世纪这场以浙江为中心的学术运动中，欧洲传教士与杭州儒士合作对西方数学、伦理学、哲学、农学、物理学著作和中国儒学经典进行互译和传播，推动了中西方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发展。

延伸至近代，浙江籍译家为中国翻译文学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翻译小说《昕夕闲谈》^③译者即为浙江杭州钱塘人士蒋其章^④。此举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及翻译史上无疑具有开拓意义，“蠹勺居士”蒋其章因此被盛赞为“把翻译种子撒到荒原上的第一个人”，开了“介绍西洋文学的先河”^⑤。译界曾普遍认为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系中国翻译文学史之发端，实际上，这一文学翻译实践，比《昕夕闲谈》（1873—1875）晚了二十多年。纵览此后百余年浙江翻译文学史，可谓成就辉煌、名家辈出，不仅涌现了陈望道、朱生豪、王佐良、草婴等一大批优秀的翻译家，亦诞生了许多集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于一身的优秀作家，如王国维、鲁迅、茅盾、徐志摩、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夏衍等。浙籍译家的文学翻译具有文化开创性，又推动了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

纵观浙江文化发展历史，“开拓性”的特征贯穿始终，浙江人民极大地发挥了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绵延不绝的浙江文化。由此可见，浙江文化之所以具有开放性的传统，既是缘于其自身兼容并包的情怀与担当，又缘于一代又一代浙江人艰苦奋斗、开拓创新所形成的自信底蕴。

二 浙江文化“走出去”的自信底蕴

浙江文化之所以在中华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有赖于绚丽多彩的艺术文化不断展现其生机活力，另一方面，自宋代以来的“浙学”繁盛为浙江文化持续不断发展提供养分。两者共同孕育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时代浙江精神，充分展现浙江地域文化的个性与特色。

就艺术文化而言，浙江的戏曲文化和艺术是一个重要部分，也是浙江文化的金名片之一。著名浙籍戏剧评论家戴不凡先生曾在《我的家乡地方戏》中指出，一部清初以前的中国戏剧史，半部归功于浙江。由此浙江亦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摇篮”。中国最早成型的戏剧样式——南戏，即诞生于斯。在源远流长的戏曲发展史中，浙江戏曲人才辈出，涌现如高则诚、徐渭、王骥德、李渔、王国维等一大批卓越的浙籍剧作家与戏曲理论家。除此之外，浙江声腔剧种类繁多。在明传奇“四大声腔”之中，海盐腔、余姚腔均出自浙江。浙江清新优美的越剧，在众多戏曲样式中独具一格，在全国性的大型剧种中榜上有名。新时期以

^②①袁康，吴平：《越绝书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③①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293页。

^②温中兰等：《浙江翻译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③郭国义：《第一部翻译小说〈昕夕闲谈〉译事考论》，《中华文史论丛》2008年第4期。

^④韩南：《谈第一部汉译小说》，《文学评论》2001年第3期。

^⑤王俊年：《中国近代文学文集（1919—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05-106页。

来,随着越剧“小百花”的崛起,以及经典剧目《西厢记》《五女拜寿》等的涌现,浙江戏剧舞台展现出一派生机,异彩纷呈。

民间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地方文化特征,千百年来深受人民群众喜爱。浙江历史绵长,文蕴深厚,其民间艺术更是独具特色。浙江各地的传统音乐、龙狮舞以及流行于沿海地区、山区的渔歌、田歌板等生命力持久不息,至今还活跃在各自的舞台上,龙狮舞、百叶龙等民间艺术演出还多次走出国门,大展风采。除此之外,浙江民间传统造型艺术既有著名的“三雕一塑”(即东阳、乐清两地的木雕,青田的石塑与温州的瓯塑),也有极富浙江特色的民间陶瓷、金属工艺、刺绣染织、灯彩剪纸以及农民画等,在国际国内文化交流中都有积极而广泛的影响。正是这些来自民间的艺术凝聚着浙江人最朴实却也最精巧的智慧,记录着浙江人最本真的审美情趣。

如果说艺术文化是浙江文化的外在表现,那么学术文化则可以称作浙江文化的内在根源。纵览中国的地域文化研究,“浙学”自成一体。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何炳松提议对宋代以来的浙江学术确立“一定的地点与名称”^①至今,学界以“浙学含义”“浙学概念”“浙学精神”等为题的研究层出不穷。具体而言,“浙学”是指浙江地区所孕育传承的学术思想,此概念最早由朱熹提出,特指浙地的婺学、永嘉及永康之学。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被归入浙学。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叙录》中多次使用“浙学”一词概括浙江的学术源流、特色和风格。从“浙学之盛”“浙学之中兴”“拳拳浙学之意”等表达可以看出他对“浙学”的肯定。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从地理的角度作了浙东和浙西学术之分,并点明“浙东学术”的特征,认为其对经世史学与心性义理并重。民国时期,梁启超、何炳松等以前人研究为基础,续推清代“浙东史学”的概念,凸显浙学的史学和经世特色。“浙学”在经历千百年的学术磨合过程中,可以从中概括出某种共性或精神内涵。这种精神可以是王充的“求实疾虚”、叶适的“崇义谋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等等^②。从浙江人文精神的演变路径可以看出,浙江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催生了重要成果,而且得到不断传承,成为推动当代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当代浙江精神是浙学传统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它所反映和体现的是当代浙江人的创业动力与精神风貌,是新时代的浙江人文精神。而正是这种开放的浙江精神,促使“浙学”与时俱进,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借鉴吸收,从而保持自身的活力。在“一带一路”的新形势下,浙江学术更有必要进一步发扬“广采博取、包容并蓄”^③,服务浙江文化全面“走出去”。就当下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常态而言,从国际视野角度发掘“浙学”的必要性进一步凸显。“浙学”背后的内涵不仅要在整个中国文化与学术视野中进行考察,更要置于世界文明版图中来思考^④,赋予当代浙学更加广阔的视阈,为传承和发展浙江文化、推动其融入世界文化潮流贡献力量。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浙江文化塑造了浙江人积极自信的精神面貌,创造了恢宏的物质与精神文明。这种文化自信,主要源自浙江文化求真务实、敢为人先的深厚积淀,更是来源于“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基于此,如何推进浙江文化“走出去”,提升浙江文化软实力,仍值得进一步探索。

三 浙江文化“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处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交汇地带的浙江,地处开放前沿,既有地利优势,又有开放风气,养成了浙江人放眼世界、开放包容的广阔视野,具有天然的人文优势。检视传统、凝练精神,可以为当下浙江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传播者和渠道等方面提供指引,亦可为我国其他地域文化“走出去”提供参照。

(一) 利用文化资源禀赋,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文化“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内容本身的吸引力。只有具有价值和引力的文化才能得到异域文化的认同。因此,文化“走出去”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文化建设,提高文化实力,“使走出去的文化有吸引力、有穿透力”^⑤。“走出去”并

^①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88页。

^②陆敏珍:《从“浙学”的历史语境中看当下对浙学概念的建构》,《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③龚纓晏:《外来文化影响下的浙学》,《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7日。

^④何俊:《浙学的当下启示:性质、定位与特征》,《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⑤于文夫:《中国梦的文化内涵与文化走出去战略》,《光明日报》2014年5月24日。

不意味着全盘出去，只有富有浙江文化特色、体现浙江文化内涵的优秀文化才值得“走出去”。在全球化时代，面对色彩纷呈的文化品类，品牌塑造与传播至关重要。而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势必形成独特的符号与形象以便于传承与传播。由此，打造鲜明的浙江特色文化品牌是浙江文化走出去的关键^①。

就国家层面而言，中国有“儒家文化”，西方世界有“基督教文化”；就国内各省份而言，山东有“孔子文化”，甘肃有“敦煌文化”，福建有“妈祖文化”等。地域文化品牌的作用在于浓缩地域文化精髓，成为该地域文化的名片，透过特定文化品牌即能对该地域的人文风情、精神内涵等有所了解。就文化产品而言，浙江不仅有丝绸、青瓷、茶叶、戏曲等历史瑰宝，亦有图书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创意等现代内容。2018年5月，浙江省发布《关于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意见》，明确要打响“丝路之绸”“丝路之茶”“丝路之瓷”等历史悠久的人文交流品牌。由此可见，浙江省已经认识到文化品牌的重要地位，也在逐步明确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品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依托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宁波舟山港、义乌国际陆港和义新欧国际班列、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中国—中东欧博览会等平台，浙江传统和现代商品走向丝路沿线国家，与此同时，浙商在商业实践中形成的文化也得到传播。除上述文化产品之外，具体到浙江省内各地域，杭州有“西湖文化”，宁波有“阳明文化”，绍兴有“兰亭文化”等，内容丰富、各具特色。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至此，浙江已拥有杭州西湖文化景观、大运河与良渚古城遗址等三处世界文化遗产。这些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浙江文化走向世界的窗口。浙江堪称坐拥各类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应以此为基础，“增强文化精品意识”^②，“实施品牌战略”^③，总结归纳各城市文化的共同内涵，结合浙江实际文化优势，打造独具浙江特色的文化精品，并在“一带一路”的新时代背景下不断创新、丰富浙江文化内涵，以更加自信的姿态走出国门，面向世界。

（二）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建设对外传播队伍

在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形势，推动地域文化“走出去”，“人才支持是关键”^④。总体来看，浙江省“走出去”企业和高等院校是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主体。

在浙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人力资源能发挥重要的主体作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遍布海外的浙江企业汇聚了大量对外文化传播人才。每一件商品走出浙江，每一位员工走向海外，都伴随着浙江文化的输出。例如，温州市利用分布在130多个国家的近70万温州人，开展“海外传播官培育工程”，将文化产品销往世界各地。这种传播充分调动了群众资源，具有广泛性、生动性等优势。当然，应该认识到，这种对外文化传播缺乏自觉性和系统性。因此，需要从文化传播的战略高度对其开展宣传和引导，充分发挥国际化企业人员的数量、行业和地域优势。

浙江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外向型教育历史悠久，在培养对外传播人才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新形势下，国际传播人才应该具备出色的语言能力、过硬的专业技能、娴熟的文化沟通技巧和现代的国际传播理念^⑤。因此，高校外语专业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大有可为。首先，外语学习者具有更丰富的研究资料和更广阔的研究视野，可以同时了解国内外研究前沿。其次，通过借鉴西方学者对本土传统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获取多元的视角，从而激发新的思想火花。依托高校资源成立的对内对外研究中心和智库，业已成为浙江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前沿阵地。2007年成立的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重要的国家对非智库，2011年成立的宁波大学浙东文化与海外华人研究院，也已经成为开放的跨学科研究平台。这类平台汇聚了高校的优势人力资源，在浙江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培养平台出发，除本土设立的高校以外，浙江的中外合作高等教育也起步较早。例如，宁波诺丁汉大学、温州肯恩大学都属于优秀的典型。中外合作办学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走向国际的产物，同时又能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

^①徐翔：《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交媒体传播中的“话语圈层”效应》，《新闻界》2017年第2期。

^②董金华：《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浙江探索》，《浙江日报》2018年10月18日。

^③骆莉莉，龚伟，丁建辉：《浙江文化“走出去”路径探析》，《对外传播》2014年第3期。

^④何艳萍：《“一带一路”下本土文化对外传播人才培养创新研究》，《今传媒》2018年第8期。

^⑤张恒军等：《加强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思考》，《新闻界》2013年第3期。

进高等教育国际化,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交流学习,更好地传播本土文化。需要注意的是,在当前的中外合作办学过程中,存在过于重视语言及专业课程的设计,对文化课程的关注度不足的问题。因此要注意,“既不可用语言教学来代替文化教学,犯‘文化缺乏症’,也不可以本末倒置,以文化教学来代替语言教学,犯‘泛文化症’”^①。因此,利用中外合作办学的良好平台以助力“浙江文化走出去”,是培养对外传播人才的重要渠道。

文化是精神的延续,是比物质更能震撼人心的遗产。而无论是外语专业还是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学生,当下跨文化交流的时代背景,对其文化掌握及传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学校教学层面来说,不仅需要培养学生的语言技能,而且要重视学生的文化素养,增强学生的文化认知与文化自觉,只有将语言和文化有机结合才能更全面增强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从而培养综合性、高层次的外语人才,顺应时代潮流,满足国家和社会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上为学生“国际化视野”的培育提供了充分的土壤,但面对这种高度国际化的教育环境,如若没有坚守“立足本土”的原则,极易沦为“有文化的无根人”。因此,在异质文化的相互接触、交流、涤荡中,更应引导学生进一步了解、认知、传承本土文化,才能对他者文化做出正确理解和理性把握。

(三) 融合优质媒介平台,拓展对外传播渠道

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是否合适,直接影响着传播效果,而文化传播渠道的广度决定了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因此,拓宽浙江文化传播渠道,构建并创新浙江文化“走出去”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纵观浙江的对外交流史,从宗教经典的传人、科技著作的引进到文学作品的输入,图书翻译出版一直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翻译是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文化交流和沟通思想感情的重要途径。“翻译工作作为文化传播的必经之道,是决定文化传播效果的直接因素和基础条件。”^②有鉴于此,一方面应当依托高校及社会平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浙江文化典籍和现当代作品进行对外译介。近年来,浙江

先后成立浙江翻译研究院、浙江师范大学与北京语言大学合作共建汉语国际传播联合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高校还与国外多所高校联合建立孔子学院。这些专门的研究和教育传播机构,依托高校平台和资源,为浙江文化对外译介与传播开辟了广泛的领域,在实施“经典浙江”译介工程,开展浙江学术外译项目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近年来,浙江出版联合集团通过国际影展、书展、版权贸易等形式,重点推介麦家、王旭峰、黄亚洲、叶文玲等浙籍知名作家的作品,扩大了浙江图书的国际影响。当然,在译介和传播主体上,除依赖本土译者外,亦可聚集国内外浙江文化研究专家,组建中外合作编译团队,力求在“他者”文化中呈现最原汁原味的浙江文化。对于历史底蕴深厚、学术内涵系统、地域特色鲜明的浙江文化,加强本土文化建设,引导国外学界主动探索也应成为努力的方向。只有当国外处于学习和借鉴的目的而进行自我开启才能真正实现浙江文化“走出去”。

除图书翻译出版外,还应当充分融合数字出版、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介,积极发挥新媒体、融媒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浙江省拥有横店影视、杭州数字出版、乌镇互联网经济、金华数字创意等一大批优质媒介品牌,这些企业通过文化产品出口,与国际同行开展战略合作,为浙江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广阔渠道。相关网络文学、影视等产品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顺便提及一点,文化产品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应当提升产品文化水准,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近期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与浙江新闻频道通力合作,定期推出文化专题节目《文化浙江大讲堂》,通过讲座形式,邀请省内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资深专家学者对浙江文化进行深入讲解,节目还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发布,扩大传播受众。虽然该举措仍以中文传播为主,但不失为对外传播浙江文化的学习模板。在步入“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寻求互联网与文化的跨界合作亦值得进一步探索。如在2017年由省文化部门和浙江大学共同举办的“互联网+中华文明”展览中,通过数字化手段对良渚古城及水坝等大型土建工程进行的数字虚拟复原,由此引发观众对良渚整体文化面貌的好奇与探索的兴趣。又如宁波大学阳明文化海外传播团队,历时三年打造的

^①赵爱国,姜雅明:《应用语言文化学概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55页。

^②黄友义:《发展翻译事业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繁荣》,《中国翻译》2008年第4期。

《〈传习录〉中英双语漫画》读本，以电子文本、音视频文本的形式走进六家海外孔子学院，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漫画为载体，讲述浙东文化名片——王阳明的心学思想。通过类似的多模态传播途径，将原本停留在古籍经典、珍稀文物中的文化娓娓道来，能够帮助世界人民更深刻地感受到浙江文化的自信与力量所在。

当然，拓展传播媒介，本质上离不开提升传播内容的质量。传播渠道与模式毕竟只是外在实施形式，浙江文化本质上的感染力与影响力才是“走出去”的立足点。

结语

随着浙江与世界日益接轨，浙江文化的国际化趋势愈加明显，如何把握时代契机实现浙江文化走出去已成为浙江学者不断探索的新命题。从文中的考察可以发现，浙江文化具有雄厚的历史积淀，呈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印记，由此奠定建设文化强省的坚实基础。而地处沿海的天然

地理优势则赋予浙江与生俱来的“开放”精神。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浙江文化要走出去，必须进一步传承创新传统文化产品和文化精神，增强国际视野与意识，进一步增强参与全球竞争的自信和底气，充分发挥浙江文化的优势，大胆吸收异质文化中的竞争元素，扬弃浙江文化自身传统的不适用元素，通过“他者”激发“自我”。可以说，突出文化品牌、培养传播人才、拓展传播媒介，业已成为浙江文化对外传播的有效路径。

浙江文化应当充分利用自身文化资源与区位优势，抓住新时代背景下的诸多机遇，继续“勇立潮头”，争做世界文化长河中一颗耀眼的明珠。而讲好浙江故事，传播浙江声音，提升浙江文化在新时代的国际传播能力，为世界文明贡献“浙江智慧”，正是浙江文化“走出去”的真正追求与价值。浙江文化对外传播实践表明，中国文化走出去，地域文化是主体。各地应充分总结地域文化走出去的历史，打造地域文化特色品牌，培育地域文化传播人才，开拓地域文化传播渠道，才能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历史洪流中，发挥应有的作用。